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

张一兵 主编

MAKESIZHUYI YANJIUCONGSHU
MAKESI SIXIANG BIANQIAN DE SHEHUIZHUYI XIANSUO

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

韩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

张一兵 主编

MAKESIZHUYI YANJIUCONGSHU

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

韩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韩蒙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4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214-25821-2

I. ①马… II. ①韩…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24298 号

书 名 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
著 者 韩 蒙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 25 插页 3
字 数 322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5821-2
定 价 6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 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史语境 2
- 二、马克思思想总体中的哲学与社会主义 7
- 三、社会主义线索中马克思思想的变迁过程 14

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历程 19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19

- 一、早期共产主义的自然法奠基与实践转向 20
- 二、社会主义的两条进路：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 28
- 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初始融合 34

第二节 英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39

- 一、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社会改造方案 39
- 二、功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 43
- 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科学”协调 47

第三节 法英社会主义的德国化进程 52

- 一、“德法联盟”：德国理论与法国政治 52
- 二、市民社会的扬弃：法哲学与社会主义 59
- 三、个人与类的统一：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主义 66

第二章 人的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构想	75
第一节 法哲学批判的社会主义语境	75
一、贫困的发现与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	76
二、哲学的世界化境遇与共产主义的现有形式	81
三、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与共产主义的理论阐述	89
第二节 从法哲学逻辑到社会解放理念	94
一、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与社会的特有逻辑	94
二、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解放与共产主义存在	103
三、社会解放理念的自我阐明与无产阶级实现	112
第三节 社会解放理念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意义	121
一、“实践政治派”与“理论政治派”	122
二、共产主义的教条观念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	128
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性批判	134
第四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国社会主义	142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复调格局	142
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150
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种人道主义的辨识	157
第三章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165
第一节 如何看待“群众的社会主义”	166
一、对“群众”的思辨想象与现实考察	166
二、“群众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	174
三、社会主义境遇中的三个理论追问	183
第二节 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三重进展	189
一、社会主义与工业生产力的理论联结	190
二、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史图谱	198
三、“实践”概念：物质生产实践与共产主义实践	20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思潮的唯物主义审视	211
一、历史观阐释中的共产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	211
二、共产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与蒲鲁东的形而上学	220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正义者同盟	229
第四节 共产党人的历史观与共产主义观	234
一、共产主义的叙述形式：寓言、信条与宣言	235

二、从理论家的构想到共产党人的实践	240
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基于唯物主义的选择	245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认知	252
第一节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资本论》创作	253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困局与自我革命	253
二、简单流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哲学界划	262
三、国际工人协会期间的“资本主义”理解	271
第二节 “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认知	279
一、从劳动到劳动力的术语革命	279
二、从手工工场到现代工厂的场域转换	286
三、从无产阶级到工人阶级的重新定位	296
第三节 “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05
一、平等交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	305
二、劳动货币是自行取消的政治经济学要求	311
三、经济斗争与政治夺权之间关系的误识	317
第四节 “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层级	326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性自识	326
二、社会变革与人的变革的总体图景	334
三、资本批判理论与普遍政治行动	344
四、具体化道路中生成的革命策略	353
结语	361
主要参考文献	370
后 记	379

导 论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概念频繁出现于马克思的文本中,贯穿了他思想变迁的始终。透过 19 世纪的思想史视角与经典文本的系统梳理可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进入马克思思想世界,揭示其哲学变革意义的必不可少的线索。然而,在现有的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图景中,哲学史与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的线索,他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没有被真正纳入对其哲学的反思中来。

在哲学史的考察线索中,研究者主要是从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等的关系视角厘定其思想的性质、转变与内涵。哲学史线索固然最为贴近马克思本人的知识谱系,通过这一线索能够直观地指认出他如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中走出从而建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哲学的单一线索中,马克思所处时代中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不断涌现的社会主义思潮、现实工人运动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德国哲学、英法政治经济学、法英德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思想史勾连因此也就消失不见了。近些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路已经得到了重视和相对系统的阐发。马克思与斯密、马克思与李嘉图、马克思与蒲鲁东等政治经济学家的关系也进入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这种路径不仅有助于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学科壁垒,从政治经济学线索揭示出马克思思想总体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具体观点考察层面为马克思的哲学转变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参考和思想史支撑。

即便如此,在总体思想构架中,社会主义线索仍旧是不在场的,仅仅被定位于“思想来源”而处在哲学视域之外。社会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部联系仍旧晦暗不明。当走进 19 世纪的思想史和马克思一生的探索道路中时,便会产生如下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如何进入马克思思想的内部的?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总体中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和互动关系?如何在社会主义线索中整全地呈现马克思思想变迁过程,揭示其社会主义主张的思想深度?这些都是有待释疑和深入展开的基础性问题。

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史语境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 19 世纪的词汇。“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这些新造的词汇是“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词”。^①作为一个 19 世纪的人,马克思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处在相似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语境之中。进入这个时代的历史,才能准确回溯和辨析两个概念的真实含义和实际用途,以及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路的。

“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这两个词首次出现在 1803 年的意大利文出版物中,但是其与后世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直接关联。直到 1827 年,在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Co-operative Magazine*)上再次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一词,它指涉的是拥护欧文合作学说的信徒。法文“社会主义”(socialisme)一词 1832 年首次出现于由圣西门主义

^①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者勒鲁编辑的圣西门派机关刊物《地球》(*Le Globe*)上,该词主要是指圣西门的学说。^①实际上,“社会”之所以作为一种主义而被提出,是对近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是企图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来替代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经济制度。^②“社会”的对立面是“个人”(individual),“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则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由于个人主义的核心是竞争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合作、集体与互助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大众的福祉。从逻辑上看,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也是与其致力于超越个人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机制有关的。^③

社会主义逐步流行于英法并传播至整个欧洲,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即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与欧文主义(包括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圣西门从实证主义出发,凸显了工业生产、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认为最合理地组织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傅立叶主张以“劳动引力”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论证了从生产分散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欧文则立足具有“面向实际的性质”和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唯物主义,明确地在劳动价值论、财富分配与合作生产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④尽管三者在具体理路上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合作生产、协作劳动与社会组织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可见,社会主义在起源上就具有特定的哲学前提和政治经济学性质,并且是希望通过改变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加强对公民的理性教育等来塑造新的人性和变革现存社会。

与社会主义的诞生几乎同时期,法文“共产主义”(communisme)一

① 参见 G. D. H. Cole,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1, London: Macmillan, 1953, p. 1.

② 参见[美]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1册,群立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页。

③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④ 在主流认识中,欧文被归类于社会主义者,但是由于他明确赞同财产公有并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因而也被理解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他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差别。

词出现于 1830 年七月革命后的社会动乱时期,被用来称呼巴黎的秘密革命组织。从概念的构成和演化来看,“共产主义”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作为一种自治组织的“公社”(commune),此后巴黎公社就是这个层面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指物品的共有(common)、公有制(communauté)。^① 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时被提出并且迅速传播,主要缘于两个理论事件:第一,邦纳罗蒂在 1828 年出版的介绍巴贝夫思想的《为平等而密谋》中有关公有制、革命行动的构想,被人们用“共产主义”来称呼;相应的,作为巴贝夫思想源泉的 18 世纪启蒙学者摩莱里(Morelly)和马布利(Mably)也被列入共产主义者的序列。第二,卡贝在 1839 年从英国回到法国后不久就开始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并陆续出版了《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主义信条》,于是共产主义在 1840 年前后被普遍地使用起来,而且主要用来描述卡贝的思想特征。^② 可见,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反对财产私人所有的公有制,如果按照公有制的不同实现路径则可以进一步分为两派:在欧文主义影响下倡导和平演进、组织合作生产、建立公社的卡贝;支持无产阶级政治行动、推崇暴力革命的巴贝夫、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

从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本义的甄别出发,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至 80 年代,根据法英德三国的不同民族特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按照时间与国别,代表性的人物分列如下:在法国,随着 1789 年大革命而产生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巴贝夫(Babeuf, 1760—1797)及其追随者邦纳罗蒂(Buonarroti, 1761—1837)、卡贝(Etienne Cabet,

① 参见 G. D. H. Cole,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1, London: Macmillan, 1953, p. 7。在当代关于共产主义概念的讨论中,哈特(Michael Hardt)、奈格里(Antonio Negri)、南希(Jean-Luc Nancy)、齐泽克(Slavoj Zizek)、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左翼理论家就是以共有物(the common)为线索重解“共产主义的理念”,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传统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相关论述参见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London: Verso, 2010。

② 参见[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1788—1856)、德萨米(Theodore Dezamy, 1803—1850)、布朗基(Blanqui, 1805—1881);社会主义者则分为两派,一派是圣西门主义者,包括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及其门徒巴扎尔(Bazard, 1791—1832)、安凡丹(Enfantin, 1796—1864)、勒鲁(Pierre Leroux, 1797—1871),另一派是傅立叶主义者,包括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及其门徒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erant, 1808—1893),以及受到两派共同影响的路易·勃朗(Louis Blanc, 1811—1882)。在英国,主导性的思路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是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和以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 1775—1833)、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 1787—1869)、格雷(John Gray, 1799—1883)、布雷(John Bray, 也译作勃雷, 1809—1895)为代表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这一流派直接影响、孕育了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roudhon, 1809—1865)的核心主张。在晚近发展的德国,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法国和英国思潮的德国化,这一进程的核心脉络包括:延续法国共产主义传统的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深受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影响的赫斯(Moses Hess, 1812—1875)和格律恩(Karl Grün, 1817—1887),以及效仿英国欧文主义思路的恩格斯。

更重要的是,尽管上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共同使用这两个概念,但是由于哲学方法和视野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理路的深层差异。在法国社会主义内部,圣西门主义与傅立叶主义在社会历史观、政治经济学上的不同认识的根源,就在于两者分别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与唯物主义方法,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歧。法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与其哲学方法的转变直接相关:它相继经历了摩莱里和马布利对共产主义的自然法论证、巴贝夫对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论证和实践转向,以及德萨米、卡贝整合社会主义理论资源而形成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这些不同阶段。与法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依据的是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哲学原则,是通过社会经济

环境的改造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条内在线索:以欧文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向、本身从政治经济学前提出发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构社会主义的蒲鲁东和恩格斯。唯物主义成为法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同分享的哲学基础。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引入德国本土,法国社会主义思潮、英国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哲学传统的碰撞和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哲学底色的社会主义德国化版本:甘斯(Eduard Gans)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圣西门主义改造,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以行动哲学阐释法国社会主义,赫斯与格律恩对费尔巴哈人类学的社会主义转用,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整合费尔巴哈人类学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

在上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史图景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成了相互渗透、内在关联的思想总体。对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阐释,不能脱离与之相应的哲学理念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同样,对同时代哲学流派及其发展进程的把握,也不能抽离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论证所处的总体性语境。

作为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马克思就是在这种语境中接触、理解、批判进而重塑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于从德国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而言,接受法兰西思潮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其经历了如下过程:从最初由于这股思潮的“微弱哲学色彩”而采取抵触态度,到开始了解法英社会主义的德国化形态及其理论意义,乃至最终在人的自我解放层面接受社会主义思路,并在自己的积极人道主义哲学转变中完成对社会主义态度的转变。也是在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中,马克思开始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的实践品格,批判脱离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共产党人的身份介入革命运动。此后,借助对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认知和对唯物主义的深化理解,马克思才真正洞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局限和空想主义本质,从而自主探索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内部,科学社会主

义的建构过程,也是新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

相应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法英德社会主义的内里差异,也与其哲学理念直接相关。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与法英社会主义注重政治经济学改造和经济斗争、法国共产主义强化政治行动和暴力夺权的思路相区别,马克思始终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的统一,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融合革命实践和科学理论的“革命的科学”。就社会变革与人的变革的关系而言,不同于仅仅强调社会环境改造的旧唯物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方案,也不同于从费尔巴哈人类学出发抽象探讨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案,马克思是在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中阐发人的自我变革的可能性和能动性的。就普遍性的世界历史与特殊性的民族道路的关系而言,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俄国理论家赫尔岑和巴枯宁等人,都是由于身处后进国家而受制于有限的民族视野,忽视了在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运动中开拓特殊发展道路的契机。这正是马克思所致力于的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探索。

二、马克思思想总体中的哲学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线索。在这条线索中推进马克思思想研究,首要地意味着呈现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和互动过程。根据对待马克思思想总体中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论态度,可以将以往的研究模式概括为四种。这四种模式各有其理论贡献和局限。

第一,将哲学与社会主义割裂的“三个组成部分”模式。关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典型提法始于列宁。列宁在191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1914年11月为俄国《格拉纳特百科词典》而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词条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表述:“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

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马克思是 19 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②。

从效果上来说，列宁的这种条块分明的三个部分划分确实有助于清晰说明“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科学地位，从而便于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质性划分，容易忽视三者思想史以及在马克思思想总体中的内在关联，进而错失马克思文本所展示的总体性视野和思想厚度。这种思路在之后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衍生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解读模式。俄国学者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彼·沃尔金、马里宁、A. M. 德波林、B. A. 罗什科夫等，欧美学者柯尔(G. D. H. Cole)、马克斯·比尔等，以及国内学者高放、黄达强、吴易风、戴清亮等，都在研究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只是，这种研究路径仍旧受限于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导致社会主义与哲学之间的联系被割裂，社会主义思想被从复合语境和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简化为独立于哲学思考的政治结论或经济学说。

与此同时，部分欧美、西亚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如阿维纳瑞(Shlomo Avineri)、胡克(Sidney Hook)、塔克(Robert C. Tucker)、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部分日本学者如城塚登、广松涉、柄谷行人，已经逐步意识到从社会主义思路本身探索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要素与转变契机的重要性。例如，广松涉指出，不能将青年马克思思想“嵌入”作为“成立事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的综

① [俄]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67 页。

② [俄]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 7 页。

合统一”的图式中。^① 国内部分学者也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互动关系视角反思与批判了这种解读模式,特别是围绕《资本论》哲学内涵的研讨^②。但是,从根本上说,目前研究仍旧缺乏对社会主义线索的总体呈现以及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哲学诠释。马克思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研究还是有待突破的理论盲区。

第二,将哲学与社会主义等同的“哲学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对“三个组成部分”模式的代表性回应之一,这种模式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泛哲学化的解读,将社会主义抽象为脱离现实工人运动和社会经济进程的永恒真理或道德准则。按照伍德(Ellen Wood)的界定,这一思路的代表就是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到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New ‘True’ Socialism)。在这一思路中,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是由直接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的,“这种理论策略有效地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因而在解放图景中以“激进民主”的话语革命替代了“本质主义”的社会主义。^③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经典“真正的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的复苏。回到 19 世纪的德国社会主义语境中,以赫斯、格律恩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将法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其得以产生的现实社会运动中抽离出来,与费尔巴哈人类学相嫁接而提出了以人的本质的实现为诉求的伦理社会主义。这种解读模式的局限不仅在于哲学方法论限于思辨层面,更主要的是没有深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情

① 参见[日]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载《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6 页。

② 关于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重释马克思的哲学转变,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③ 参见 Ellen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Verso, 1986, pp. 2-3.

境去探求其背后的工业发展与无产阶级境况。对于马克思而言,有关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构想,需要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的实践行动中实现。

关于马克思本人是否存在一个“哲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阶段,也构成美国学者胡克与穆尔(Stanley Moore)关注的焦点^①;国内学者张奎良、卜祥记等也对马克思与“哲学社会主义”思路之间的批判性继承关系有所论及。但是,若要彻底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厘清马克思在哲学转变中对人道主义的超越、对人的自我解放的唯物主义论证,从而在社会革命中阐释人的自我革命,揭示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哲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异。

第三,哲学与社会主义互动关系的黑格尔主义解读模式。与前两种模式不同,这种解读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黑格尔哲学起源为主线,尝试理解、联结、架构马克思的哲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持有该思路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尔库塞、阿维纳瑞、亨特(Richard N. Hunt)、塔克、胡克、布雷克曼(Warren Breckman)、广松涉。

这种路径着力于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关联。例如,阿维纳瑞在《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中强调,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其早期与晚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共产主义始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哲学扬弃。^②亨特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念》中指认,马克思的政治理念经历了从黑格尔立场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完成了“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③。按照布雷克曼在《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中所说,黑格尔哲学对既有的法英共产主义思想的超越,被早期德国左翼分子卢格、赫斯、马克思所接受,对

① 参见 Sidney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0。

② 参见[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③ 参见 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4. p. 53。

于整个社会主义德国化进程产生了持续影响。^① 广松涉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中也着重凸显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的黑格尔哲学元素：马克思的“民主制”、“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对决”中产生的，是对“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扬弃”所出现的矛盾的解决方案。^②

该路径还呈现了马克思接触和理解社会主义思潮的哲学史线索。就马克思与德国法学家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关系，塔克在《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中记述了他与阿维纳瑞、亨特围绕青年马克思接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途径问题所展开的论战，其中着重谈及了马克思是如何从施泰因的著作中习得“无产阶级”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初认识的。^③ 就马克思与圣西门等社会主义者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突出了圣西门、孔德、施泰因等所代表的实证主义与黑格尔的关联以及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奠基作用，初步觉察出圣西门实证主义与傅立叶唯物主义的哲学差异。^④ 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按照阿维纳瑞的看法，由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延续，因而与作为法国唯物主义继承者的恩格斯是有差异的；托马斯(Paul Thomas)更是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中明确区分了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层面理解的科学(Science)与马克思在德国观念论传统中把握的科学(Wissenschaft)。^⑤

① 参见[美]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参见[日]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载《赫斯精粹》，第219页；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 参见 Robert C.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06 - 110.

④ 参见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41, p. 330.

⑤ 参见[美]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王远河、王克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